

生态系统视角下社会企业介入喜憨儿就业的研究

——以喜憨儿烘焙坊为例

朱盼玲

(云南民族大学,云南昆明 650091;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广东佛山 528000)

摘要:推动并实现喜憨儿就业,对群体本身而言是最佳的福利供给和最有效的社会融合,对社会而言是减缓社会矛盾的有效举措。引入生态系统理论分析喜憨儿烘焙坊在促进喜憨儿就业方面的实践经验,发现可通过倡导公益消费理念,构建公益连锁系统,发挥社会企业作用,协同政府、社区、家庭等多元主体构建可持续的就业生态系统等举措,达到改善喜憨儿生存状况、促进喜憨儿就业的目的。在社会企业介入喜憨儿就业的过程中,应注意协调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行政依赖与自主能动之间的平衡问题。

关键词:生态系统;社会企业;喜憨儿

中图分类号:D669.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303(2021)03-0030-08

一、研究缘起

2015年7月,中国残联、国家发改委、民政部、财政部等八部门共同印发了《关于发展残疾人辅助性就业的意见》,文件对辅助性就业和辅助性就业机构进行了界定,提出了发展目标,明确了扶持政策和相关部门的职责。同年7月,李克强总理就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工作做出重要批示,指出提高残疾人就业率不仅是保障基本民生,也是践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动体现。2017年7月,中国残联办公厅对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机构的扶持政策及申请方式做了具体的解

释和规定,进一步推动了残疾人就业进程。经过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界的共同努力,残疾人就业取得了很大成绩。根据中国残联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到2016年底,我国896.1万名残疾人实现就业,2017年,城乡持证残疾人新增就业35.5万人^[1]。

心智障碍者是残疾人中数量较多的一类,通常被称为“喜憨儿”。“喜憨儿”中的“喜”字取自谐音“惜”,指心智障碍者的家人应减少对其怜惜的情感成分,增加对孩子的喜悦之情。这种称呼也暗含了社会各界应该对喜憨儿持有的态度。据统计,目前我国喜憨儿接近1000万人,主要包括智障、自闭症、唐氏综合征患者。相比其他类

收稿日期:2021-04-01

作者简介:朱盼玲(1985—),女,河南濮阳人,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专业2019级博士生,佛山科学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民族社会学,社会工作。

型的残疾人来讲,喜憨儿的脆弱性特征更加凸显,对社会的适应性更差,就业也更困难。因此,需要社会各界给予特别关注。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就业结构性矛盾持续存在,残疾人就业形势更为严峻。推动并实现残疾人就业,对残疾人而言是实现福利供给和社会融合的最佳渠道,对社会而言是减缓社会矛盾的重要举措。怎样使喜憨儿有尊严地就业、构建可持续的就业生态系统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台湾喜憨儿烘焙坊在促进喜憨儿就业方面的积极措施及良好效果随之进入了笔者的研究视野。

二、构建喜憨儿就业生态系统的理论基础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简称生态系统理论,查尔斯·扎斯特罗是生态系统理论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该理论认为,人们在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中生存,这个系统通常包括家庭系统、朋辈系统、工作职业系统、宗教系统等^[2]。查尔斯·扎斯特罗把人的社会生态系统区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微观系统指个人的心理、生理和社会状态,中观系统指家庭、社区、社会企业等,宏观系统指媒体、社会文化、公众态度等。每一个人的社会生态系统都同时包含这三类系统。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中的家庭、朋辈、工作单位、文化、宗教等均可归纳到社会环境的范畴。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是双向的,社会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可对人类行为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反之,人类行为也可以作用于社会环境,二者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

遵循生态系统的思路,个人的生存环境是一个完整的生态体系,只有让隐藏在该体系中的各因素良好互动,才能保证整体功能的最大限度发挥。作为社会的重要个体成员,喜憨儿也有自身

的生存环境,并在与环境的互动中形成了完整的生态系统。这个系统既有与其他社会成员的系统一致的共性特征,也有喜憨儿群体的特殊元素。因此,我们应该辨析个体生存环境的差异,并从个体与环境的发展关系中探索喜憨儿就业的优化路径。根据生态系统理论可绘制出如图1所示的喜憨儿就业影响生态系统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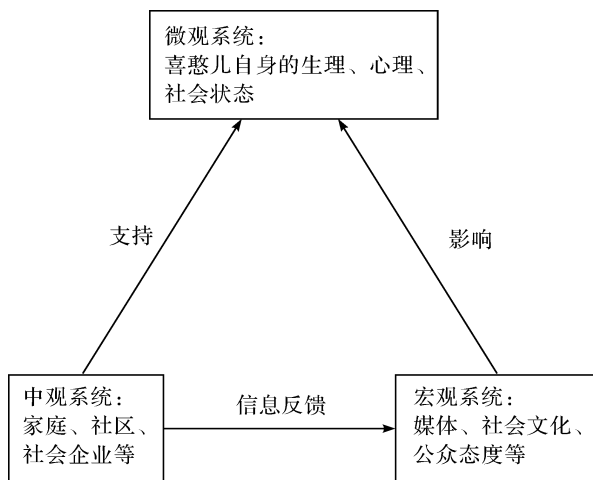


图1 喜憨儿就业影响生态系统图

从图1可以看出,喜憨儿处在一个由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组成的生态系统中,并与系统中各因素持续互动。微观系统指喜憨儿自身的生理、心理、社会状态,这是喜憨儿就业的基础要素,直接关系到喜憨儿的就业状况;中观系统是喜憨儿就业的关联场所,它包含可近距离影响喜憨儿就业的因素,如家庭、社区、社会企业等,其中,社会企业是吸纳喜憨儿就业的最主要机构;宏观系统包含媒体、社会文化、公众态度等社会环境因素,这些因素对喜憨儿就业起到重要的间接影响。依据生态系统理论,要从改善喜憨儿生存的社会环境、完善就业影响生态系统中的组成要素、促进喜憨儿与就业影响生态系统各要素的良性互动几方面探索促进其就业的可能。因此,喜憨儿就业不仅仅是其自身的事情,更是一个结构性的社会问题,需要多个层面的社会行动主体共同参与。如何提高喜憨儿就业的数量

和质量,改善喜憨儿的生存环境,是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作为解决社会问题、增进公众福利的社会企业,在喜憨儿的就业过程中,如何通过协同家庭、社区、媒体等多元社会主体,构建可持续的就业生态系统,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三、案例介绍及经验分析

(一) 案例介绍

社会企业的概念最早由英国社会经济发展学家 Freer Spreckley 提出,指由员工或特定社区共同拥有的,有社会及商业目标,并以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合作的方式运营的机构。^[3]台湾喜憨儿烘焙坊(含餐厅)是促进喜憨儿就业的社会企业典范。作为喜憨儿的就业载体,它主要为年满16周岁并持有身心障碍手册的喜憨儿提供就业服务,包括就业辅导、工作表现评估、心理或行为辅导、家庭服务、身心调试等。喜憨儿烘焙坊不仅在台湾多个城市开设了实体店面,还研发了喜憨儿购物网(C-Shop),且能提供商品检验报告。社会企业的出现,为残疾人的就业和社会融入提供了新的选择,为残疾人事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同时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提供了更多可能。

台湾喜憨儿烘焙坊的成功得益于它的三种产业化经营模式,即遵循典范转移趋势、创新价值体系、培养核心能力。第一,喜憨儿烘焙坊的愿景使命、经营理念与新典范转移的策略高度吻合,如积极创造社会价值的价值观、自我开创资源与讲求绩效的效率观、借由支持性就业进入竞争性市场的竞争观等。第二,喜憨儿烘焙坊的价值体系结合了传统的一般组织的价值链与非营利组织的价值链,是经济价值链与社会价值链的结合。喜憨儿烘焙坊强调,在竞争中实现目标盈余后,仍需回归至非营利组织价值链的资源投

入,直至最后实现社会价值。第三,喜憨儿烘焙坊在竞争中培养了两个方面的核心能力:产品的差异化和社会价值创造。产品的差异化在于喜憨儿永葆纯真,产品融入了爱心,这是其他商品所不具备的;喜憨儿在提供服务的同时,能直接接触社区民众,获得肯定与关怀,喜憨儿从资源消耗者变为了资源创造者,通过创造价值回归社会。

(二) 经验分析

就业是喜憨儿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据生态系统理论,我们必须关注实现喜憨儿就业的个体心理、社会参与、家庭、社区等功能,通过就业实现喜憨儿更加全面的社会融合和发展才是促进喜憨儿就业工作更具价值理性的目标^[4]。喜憨儿烘焙坊在促进喜憨儿就业方面,有着独特的值得借鉴的经验。

第一,倡导公益消费理念,促进喜憨儿有尊严地就业。喜憨儿自身的身心障碍使其就业的脆弱性特征更加凸显。在就业市场上,他们处于“被剥夺”的边缘位置。传统观念只看到他们的困难和缺陷,忽视了其优势和资源,将喜憨儿就业视为社会问题和社会负担,并用“帮扶”“救助”的策略协助喜憨儿就业。事实上,相比施舍和同情,喜憨儿更需要尊重和接纳。童星和祝萍在对残疾人就业进行研究时,均提出要摒弃“社会排斥”,运用“优势视角”看待残疾人的潜能与显能的理念^[5-6]。喜憨儿烘焙坊正是摒弃传统观念,看到了喜憨儿的优势资源和发展机遇,将喜憨儿视为普通的劳动者,针对喜憨儿的工作能力安排恰当的工作。当笔者去喜憨儿餐厅参观时,管理人员告诉我们:“你们把他们当作普通的服务员就行了,跟平时消费一样。不要把他们当作残疾人看待,他们能胜任这份工作的。”喜憨儿烘焙坊的做法与其使命高度吻合。其使命便是为心智障碍者赢得生命的尊严与生存的喜悦,倡导

以爱与关怀化解障碍,协助喜憨儿获得回归社会的机会。运用优势视角协助喜憨儿就业,既能帮助其家庭减少压力,又能维护其尊严、使其工作能力得到提高。根据苏国祯提出的价值供给金字塔理论(见图2),一般服务机构给予喜憨儿的是第三层——服务,而喜憨儿烘焙坊在维护喜憨儿尊严、促进其正向改变方面已经做到了最高层,即注重引导喜憨儿自身的转变^[7]。

此外,喜憨儿烘焙坊积极宣传公益消费,正确引导社会大众的消费观。它的做法在社会上

引起热烈反响,社会大众对喜憨儿表现出极大的包容,并将到烘焙坊购物或到餐厅就餐视作普通消费,这在很大程度上对喜憨儿的努力给予了肯定。对照前面绘制的喜憨儿就业影响生态系统图可知,喜憨儿作为个体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存在于社会生态系统中,其就业行为必然会受到社会环境,比如社会文化、公众态度等的影响。因此,良好的公益消费理念及包容的公众态度将对喜憨儿就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促进喜憨儿就业与社会环境形成良好的互动与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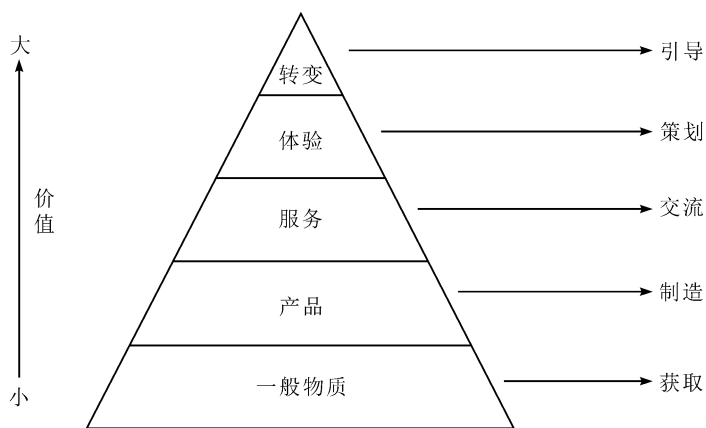


图2 价值供给金字塔

第二,构建公益连锁系统,维护喜憨儿社会化的可持续性。个体通过与社会环境的交互作用,不断从家庭、学校、工作单位等社会环境中习得社会规范与社会价值,以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这是个体社会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持续的、不间断的,它直接关系到个体的生活质量和适应生活的能力,对个体发展至关重要。工作单位是喜憨儿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因而,喜憨儿能否顺利就业、就业质量如何关系到其社会化的成功与否。目前,我国很多城市对喜憨儿主要采取辅助性就业或庇护性就业策略,即将其工作场所与社会隔离,将喜憨儿排除在常态社会之外。显然,这种做法非常不利于他们的社会化。台湾为了维护喜憨儿社会化的可持续性,构建了公益连锁系统,除烘焙坊、餐厅以外,还成立了喜憨儿乐

团、喜憨儿剧团、喜憨儿儿童军团等机构,满足喜憨儿多层次的需求。考虑到喜憨儿的养老问题,专门兴建喜憨儿天鹅堡,为他们的养老提供保障,化解双重老化(指喜憨儿自身及其父母的老龄化)的困境,这种做法与烘焙坊“终生教育、终生照顾”的愿景相吻合。

喜憨儿在与普通人同样的开放场所工作,为顾客提供服务也是其学习和交往的过程。家庭、社区、工作单位、朋辈群体之间形成了有机联结,保证了喜憨儿社会化的可持续性。他们在工作过程中练就了良好的职业素养,社会交往能力不断提升,为成功社会化奠定了基础。依据喜憨儿就业影响生态系统图,作为喜憨儿主要就业载体的社会企业属于就业生态系统中的中观系统。中观系统通过与喜憨儿发生良性互动,既能支持

微观系统的存在与优化,又能将信息反馈给宏观系统,引起媒体、公众对喜憨儿就业的关注。由此可知,社会企业具有桥梁作用,是支持喜憨儿就业的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一环,是提升喜憨儿获得感的主要依赖。

第三,以社会企业为主,协同政府、社区、家庭构建就业支持系统。在生态系统理论框架下,促进喜憨儿就业要基于其生存的社会环境,从优化系统中的各要素、促进喜憨儿与社会环境的良性互动层面构建就业支持系统。喜憨儿就业生态系统的要素主要指中观系统里的社会企业、政府、社区、家庭等,这些要素之间要相互协调、共同发力,为提高喜憨儿就业质量和数量做出贡献。

喜憨儿烘焙坊之所以能成为社会企业的典范,不仅因为它为喜憨儿就业做出了贡献,更重要的是协同政府、社区、家庭,构建了喜憨儿就业支持系统。首先,政府在喜憨儿就业中认真履行责任。社会企业是喜憨儿就业的主要载体,而政府对社会企业的支持与否是影响社会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朱健刚通过对 G 省社会企业的调查发现,约 60% 的受访组织认为“政府为社会企业的发展创建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至关重要”^[8]。政府可通过政策措施、经费补助、给予 NPO 承租土地与建筑物的特许权等方式为社会企业增加“助力”^[9],倡导“平等、参与、共享”的现代文明社会残疾人观,在残疾人就业中的责任^[10]。台湾喜憨儿社会福利基金会经费的 20% 由政府拨款,政府拨款为其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7]。台湾喜憨儿社会福利基金会获得政府承租土地特许权,设于台北市市政府大楼里的 Enjoy 餐厅也是市政府释放出的空间,规定只可以供身心障碍者经营,租金低、客源稳定的优势对支持喜憨儿就业起到了积极作用^[9]。此外,政治关键人物协助促销社会企业产品,台北市市长办公室会定期购买喜憨儿 Enjoy 餐厅的点心,特

殊节日时市长会亲自主持庆典活动,为喜憨儿产品做宣传。上述做法都体现了政府在社会企业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政府在喜憨儿就业中认真履行责任,是对喜憨儿最大的支持和接纳。其次,社区为喜憨儿就业提供有效支持。喜憨儿只有融入社区,以自立自强的方式,通过就业才能回归社会主流、实现社会价值。2017 年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 942.1 万人,其中社区就业 8.0 万人,占比不足 1%^[1]。可见,社区就业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喜憨儿烘焙坊的特色便是将喜憨儿就业与社区服务结合起来,依托社区阵地,推动喜憨儿融入社区、参与劳动。最后,喜憨儿父母应改变观念,多给予鼓励和支持。喜憨儿家庭对其就业的最大贡献是情感支持,理解并相信他们,协助其挖掘优势资源。

(三) 社会企业促进喜憨儿就业的启示

喜憨儿烘焙坊秉承“爱心、专业、人性化”的理念,倡导公益消费,构建公益连锁系统,担负起了“改变喜憨儿命运”的使命。目前,我国的喜憨儿因政策、社会制度等环境因素的制约,就业尚不充分。借鉴喜憨儿烘焙坊的成功经验,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以促进喜憨儿就业。

第一,提高社会企业认可度,营造良好的扶残助残社会环境。喜憨儿烘焙坊之所以能在台湾发展壮大,是因为台湾社会对喜憨儿持包容、接纳的态度,对社会企业的接受程度和认可程度都比较高。社会企业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社会价值,还带来一定的“溢出效应”。如一位英国官员所说,“向一位优秀的私人承包商支付 1 英镑,只得到 1 英镑的服务;向一家社会企业支付 1 英镑,你会得到 1 英镑的服务、10 便士的社会包容、10 便士的环境保护以及当地社区内资源循环利用所创造的利润”^[11]。而在我国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形成这样的社会氛围,民众更习惯向

商业组织购买商品和服务,对社会企业的公益性了解较少或表示怀疑,对其认可程度较低,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社会企业的发展。

2016年8月,国务院发布的《“十三五”加快残疾人小康进程规划纲要》指出,要充分利用电视、报刊、微信、微博等媒体,大力弘扬“平等、参与、共享、融合”的现代文明理念,营造尊重、理解、接纳残疾人的社会环境^[12]。因此,社会各界应各司其职,共同为社会企业的发展、喜憨儿就业率的提升做出贡献:政府可通过微信、微博等方式大力宣传社会企业的成功案例及其社会贡献,提高社会企业的影响力,加强公众对社会企业及其精神的理解^[13];学术界应该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科研成果,加强对社会企业介入喜憨儿就业的研究;发达地区的社会组织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设立喜憨儿就业方面的创投比赛,宣传社会企业,吸引公众参与。如此,不仅能提升民众对社会企业的认知度和对喜憨儿就业的支持力度,也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第二,加强支持性就业模式在推动喜憨儿就业中的作用。支持性就业的思路最早由马克·戈尔德(Marc Gold)提出。支持性就业的具体内涵在美国1986年修订的《康复法案》中被界定,即身心障碍者进入融合的职业场所从事竞争性工作的一种就业模式^[14]。台湾喜憨儿烘焙坊在推动喜憨儿就业过程中,较好地选用了支持性就业模式。支持性就业在欧美、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已经成为促进喜憨儿就业的主流模式。根据美国2005—2010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支持性就业中,喜憨儿数量占到了77%^[15]。美国支持性就业的基本原则包括尊重残疾人意愿、职业康复与精神疾病治疗同时进行、竞争性就业、持续的支持服务等。从这些原则中可以看出,支持性就业模式相较于集中就业模式的优势在于:喜憨儿工作场所不再是隔离的,而是开放的,在这种

融合的工作环境中就业,更有利于喜憨儿的社会化;喜憨儿在就业过程中不但可以提升工作技能,还可以同时接受精神疾病方面的治疗;竞争性就业可以减少喜憨儿对集中就业的依赖,增强其独立性。

当前环境下,对喜憨儿的支持性就业模式在中国大陆的认可度尚低,发展缓慢。借鉴上述成功经验,我们需要大力推广支持性就业模式,提高其被认可和接纳的程度,从而减少喜憨儿对庇护性就业的依赖,增加其独立性;以尊重喜憨儿的人格为前提,从他们的本质需求出发,做好支持性服务,比如职业康复、精神疾病的跟踪治疗、心理和情感的支持等;做好学校和工作单位之间的转衔服务,喜憨儿从特殊教育学校毕业时,学校应该与支持性就业单位密切配合,做好转衔服务,为喜憨儿顺利就业打下基础。

第三,创新多元就业模式,提高喜憨儿就业的针对性。从实践来看,社会企业致力于社会创新^[16]。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治理创新的关键时期。保障残疾人平等就业的机会和权利是政府高度关注的民生问题,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应针对不同残疾等级的喜憨儿,创新多元就业模式,提高喜憨儿就业的针对性,满足其个性需求。可由专业机构对喜憨儿就业能力进行评估,对有充分能力进入劳动市场的,应支持其自主就业,或由政府、机构协助其从事与常人无异的工作;对有就业意愿但无法独立进入就业市场的喜憨儿,应支持其选择辅助性就业;完全不能进入职场的,应支持其选择进入庇护工厂等。其次,现代社会处于信息化时代,喜憨儿还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岗位就业、外包就业、自主创业等就业模式^[4]。促进喜憨儿就业对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而言,都是极大的挑战。只有创新就业模式,提高喜憨儿就业的针对性,才能提高其生活质量,从而促进其家庭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

四、讨 论

就业是民生之本,喜憨儿是残疾人中比例较大的一个群体,就业是其维持生存和融入社会的根本途径。本文以台湾喜憨儿烘焙坊为个案,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的视角,探讨了社会企业介入喜憨儿就业的经验与路径。但在社会企业介入喜憨儿就业的实际过程中,仍然存在很多除政策、制度层面之外的挑战,需要进一步讨论。

(一) 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平衡问题

从 Freer Spreckley 对社会企业的定义可知,社会企业既要顾及经济利益,又要达成社会目标,从而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一种可能。一方面,社会企业要将社会价值的实现作为首要目标,这也是与商业企业将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作为最终目的的最大区别。社会企业更强调社会责任。通过企业相关的管理模式、运营模式来解决环境、就业、健康等社会问题,帮助弱势群体实现自身价值,从而达成社会目标,是社会企业的运营宗旨。喜憨儿烘焙坊正是通过企业运营模式协助喜憨儿就业,以达到社会目标的典范;另一方面,社会企业也不能忽视经济价值的实现。公众应该跳出对社会企业的认知误区,避免道德绑架,充分认识到只有受益者、消费者付费才能为社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证^[17]。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台湾喜憨儿社会福利基金会的主要收入来自“餐厅、烘焙房的盈利”(55%),“捐赠”(25%)和“政府拨款”(20%)^[3]。可见,创收和捐赠占到了总经费的80%,这也是基金会能够永续发展的可靠保证。当然,追求盈利并不等于放任资本逐利的过度膨胀,“市场化”只是实现公益的手段而不是目的^[18]。因此,社会企业要将利润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始终不能脱离公益轨道。

市场逻辑与公益逻辑是社会企业的两个面向,二者之间是冲突与兼容的辩证关系。如果忽视这种冲突,社会企业的双重特征就可能发生改变,即会演变成商业企业(重视市场逻辑)或非营利组织(重视公益逻辑)^[19]。因此,我们应当正视这种冲突的存在。社会企业发展过程中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每个发展阶段各有侧重点。正如 Dees J. G 和 Corner P. D 所提出的,“社会企业是将商业和慈善两个因素整合为一种富有成效的平衡状态,在发展过程中,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侧重点会动态调整^[20-21]。”当然,这种调整应处于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否则可能导致社会企业偏向社会价值或经济价值的任意一边,从而背离社会企业的初衷^[22]。

(二) 行政依赖与自主能动的倾向问题

随着社会的快速变迁和发展,社会问题逐渐增多,社会企业的“供给—工具型”特征也更加凸显,俨然成为承接公共服务,尤其是喜憨儿就业服务的主要载体。中国社会结构呈现出的“强国家、弱社会”传统,导致社会企业在发育过程中不得不采取依赖行政资源的策略,这种依赖既体现在合法性资源的获取方面,又体现在社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方面。^[23]中国大陆的社会企业发展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相当部分社会企业不能从市场营运中获得持续的资金和资源支持,不得不依附于政府。但是,依据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政府并不能总是代表社会公共利益,政策也并不总是向社会领域倾斜。因此,行政依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企业的发展活力问题。当然,在社会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行政依赖与自主能动的倾向表现也不同,大致遵循“行政依赖为主—行政依赖与自主能动并存—自主能动为主”的发展轨迹,即发展越成熟,自主能动性越强。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社会企业面临着

薄弱的外部发展环境及不确定的内部运营环境,在资本、人才、运营等方面都存在着极大风险。因此,社会企业不能只依赖行政资源,还必须学会“造血”,以提高自主能动性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至于如何减少行政依赖、提高自主性等问题仍值得深思,亦可将其作为新的话题,展开进一步的思考与讨论。

参考文献:

[1]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2017 年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EB/OL]. http://www.cdpf.org.cn/zcwj/zxwj/201804/t20180426_625574.shtml.

[2] 师海玲,范燕宁.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阐释下的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94-97.

[3] 宋春艳.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框架下我国社会企业发展的困境及对策[J]. 求索,2015(3):24-27.

[4] 邓锁. 信息化背景下残疾人就业模式及政策支持路径分析[J]. 残疾人研究,2016(1):62-68.

[5] 童星. 残疾人就业援助体系研究——由“问题视角”转向“优势视角”[J]. 残疾人研究,2011(3):19-22.

[6] 祝萍. 优势视角下残疾人劳动就业问题研究[J]. 东岳论丛,2014(5):55-59.

[7] 苏国祯. 喜憨儿 NPO 策略优势[M]. 高雄:台湾前程出版社有限公司,2013:71-72.

[8] 朱建刚. 社会企业在当代中国的阶段定位与价值取向[J]. 社会科学辑刊,2018(2):69-77.

[9] 官有垣. 社会企业组织在台湾地区的发展[J]. 中国非营利评论,2007(1):146-181.

[10] 赵启峰. 残疾人就业中的政府责任[J]. 中国残疾

人,2011(1):59-60.

[11] 顾远. 社会企业 ABC[M]. 北京:中国公益研究院,2014:35-37.

[12] 国务院. 关于印发“十三五”加快残疾人小康进程规划纲要的通知 [EB/OL].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8/17/content_5100132.htm.

[13] 张军果,张燕红,甄杰. 社会企业:内涵、欧美发展经验及其启示[J]. 企业经济,2015(4):64-66.

[14] 宋颂. 国际残疾人支持性就业比较研究[J]. 残疾人研究,2015(1):66-69.

[15] 杜林,李伦,雷江华. 美国残疾人支持性就业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J]. 中国特殊教育,2013(9):16-22.

[16] 王天夫,郭心怡,袁丛珊. 社会企业:社会治理创新的新动力[J]. 社会政策研究,2017(2):94-106.

[17] 张毅. 社会企业应向道德绑架说不[J]. 新产经,2017(7):30-32.

[18] 邵丹丹. 刍议公益市场化的困境与突破[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S1):77-82.

[19] 刘振,崔连广,杨俊,等. 制度逻辑、合法性机制与社会企业成长[J]. 管理学报,2015(4):565-575.

[20] DEES J G. Enterprising Nonprofits [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8(1):55-67.

[21] CORNER P D, HOM. How Opportunities Develop in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2010(4):635-659.

[22] 谢家平,刘鲁浩,梁玲. 社会企业:发展异质性、现状定位及商业模式创新[J]. 经济管理,2016(4):190-199.

[23] 吴磊,俞祖成. 多重逻辑、回应式困境与政策变迁[J]. 江苏社会科学,2018(3):89-98.

(责任编辑:卫甜甜)